



中国最具品牌价值专业报

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

改革需要“思想”
周末

既得利益集团，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，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，完全不理睬已急速变化的现实，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，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，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，满口官话套话，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，保护其特权。所以，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，每前进一步，都会有思想交锋，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。

如改革之初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，就破除了“凡是”观念的羁绊。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，又进一步突破了“姓社姓资”的纠结，从而极大地解放了思想。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，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。

改革需要新思维，需要新的理论、新的思想、新的见解，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。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有心人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，都可以说三道四，品头论足。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，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、执政能力，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提供药方。当前，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，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，考虑国家的前途、民族的希望、改革的路径。

垄断思想，就会开历史倒车

对于执政者，不但不应禁锢思想，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，鼓励思想论争，并择善而从。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大解放——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。

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。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，不少诸侯国或

大贵族都出钱“养士”，招揽“门客”，以吸取智慧，谋救时良方。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，优容百家争鸣。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，兜售智谋，寻找顾主。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，向东方六国大量引进“客卿”以为己用，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，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。

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，不仅皇权独尊，思想上也要“定黑白于一尊”，焚书坑儒，统一思想，求学只能以吏为师，使强大的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。没有思想市场，社会即失去活力，人民侧目而视，不敢说话，有错无人敢谏，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，更谈不上择善而从。紧绷的社会唯命是从，唯唯诺诺，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，结果是不旋踵而亡。

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，“历代都用秦政法”。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，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。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大解放，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东西文化论争，各种主义竟说，就如何建立共和、宪政民主、民族国家、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，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己见，有的发布政纲，有的陈说厉害。

众所周知，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，订立了《临时约法》，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。但人们很少知道，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，公开发表，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。当时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，并非偷偷摸摸，而是公开发表！可以想见，连宪法都可以私拟，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。

五四思想大解放的取缔者是国民党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国民党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，搞“一个国家，一个政党，一

个主义”。历史表明，当权者垄断思想，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，反而会开历史倒车。

变革的时代，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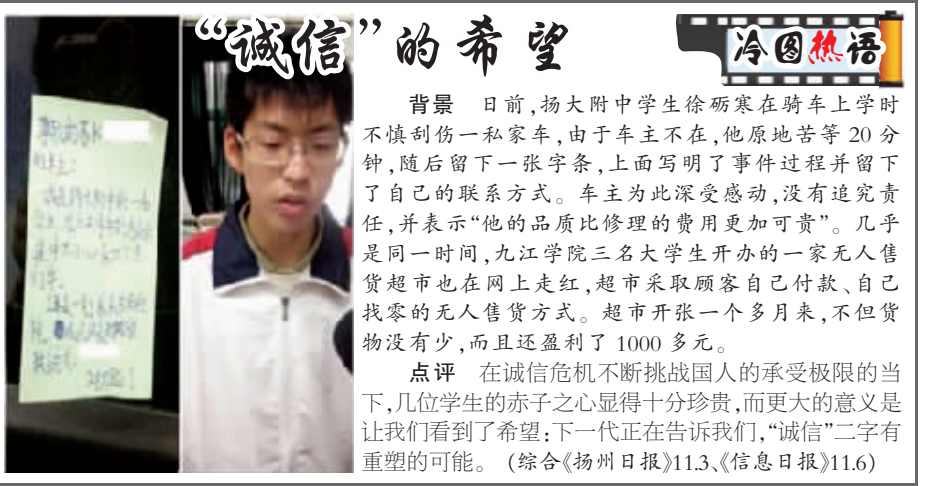
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，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。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，以其思想的完整性、深刻性、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，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。

然而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，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、艺术家称号的人，也不乏称活动家的人，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，却少之又少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认为就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。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，若不及时加以改观，长期迟疑下去，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。

大变革时代的中国，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。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，应该是自由人，不一定在体制内，不一定在官场上混，屈从依附于权力，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，保持其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指点江山，针砭时弊，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。当政者应尊重他们，左、中、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，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，任其争辩，兼容并蓄，择善以从。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。

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，下一步的路怎么走？不妨放开口言路，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，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。真理越辩越明，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，以分辨是非，探究前进方向。言路畅通，思想家辈出，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。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。

（摘自《人民论坛》11 月<上> 袁刚/文）



【视点】 人均办公经费属于“国家机密”吗？

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透露，从 2012 年 3 月份开始，他们以公民个人身份向 42 家部委机关申请公开“人均办公经费”信息，但仅有 9 家公开了自己的信息，其余 33 家部委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。其中一些部门的理由是：人均办公经费是“国家秘密”，拒绝公开。

同样是部委机关，公民申请公开的是同样的信息——“人均办公经费”，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三种结果：一是 9 家部委公开了自己的“人均办公经费”信息；二是 7 家部委至今对公开申请置之不理；三是 11 家部委以“不属于公开范围”、“国家秘密”等种种不充分理由予以拒绝。

不可否认，个别部门（如安全部门）的某些政府信息属于“国家秘密”。但是绝大多数部门的“人均办公经费”信息，只关乎行政成本 and 公民权益，根本与“国家秘密”不沾边。

“人均办公经费”，显然属于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。这样的信息不公开，公民的知情权、监督权就是一句空话。根据规定，违反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，监察机关、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。也就是说，公民申请信息公开遭遇拒绝，既可以向司法机关起诉，也可以向监察机关、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投诉，以责令改正。

（摘自《羊城晚报》11.3）

年轻人应有勇气摆脱编制崇拜

据媒体报道，哈尔滨近 3000 本科生争当清洁工，为了事业编制宁愿扫大街。此前还有报道说济南大学生甘于掏粪工岗位。这类有点离奇的事在南方省份要少见得多。所谓“编制”必将随着国家的不断改革成为历史。北方人这点应向南方人学习，早点摆脱“编制崇拜症”，早主动。

当然，大街需要人扫，粪也需要人掏，职业不分贵贱，清洁工作也需要知识和创新。这些大学生如果不是冲着编制去的无可厚非，但从媒体的报道看，他们并非真喜欢清洁工作。其实既然愿意做清洁工，为何又不敢在社会上放手一搏？如此年轻的生命，那么多年的寒窗苦读，应该积累下更多的激情和自信，不应缩在“编制”的余温下庸安一生。“安土重迁”的求稳心态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小农思想，惯性巨大。从近代以来，福建、广东、浙江等南方省份的许多人漂洋过海，闯荡异国他乡，他们用事实证明一旦走出求稳心态的囚笼，中国人可以做出多么显赫的成绩。而相比之下，受求稳观念禁锢更重的北方，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就滞后多了。

在中国致力于打破铁饭碗的改革实行 20 多年后，“编制”仍受年轻人如此追捧，社会蔓延一种颓丧之气。这一方面显示，当前中国利益分配机制仍有问题，政府人事制度改革需要继续深入。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社会观念走回头路的迹象，这是令人忧虑的。

（摘自《环球时报》11.5）

责编：王恒 范莉娜 责校：钟智勇

微言“聿”听

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，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近日撰文，他说：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，我国学术界、舆论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议论，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，需要有‘路线图’和‘时间表’，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‘顶层设计’以求‘突破’。但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，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‘理论指导’，更谈不上什么‘顶层设计’，多是‘摸着石头过河’。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，事先言之凿凿，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。

总理也享受不到的待遇 郑州挖了一个人工湖，马上要蓄水，为了迎接副省长赵建才等领导视察，将红地毯铺到了河中心。著名作家都洲洁认为，这是总理也享受不到的待遇。

那不是执法，是在演戏，是抢劫 武汉城管近日实行柔性管理——“献花执法”。如果商家配合地将占道物品搬进店里，城管会给其献上一束玫瑰花。评论员傅万夫认为：一味强调服务，什么都是柔情，柔情到了牙都酸了的地步，那不是执法，是在演戏；一味强调管理，暴力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，那也不是执法，是抢劫。

越是面对“控制者”越想挑战一下 我有数不尽的缺点，一年都数不完。成长让我学会了克服这些缺点。惟有一点我一直不会变，就是质疑权威。越是面对那些“控制者”，我就越是想要挑战一下。（好莱坞女演员蕾切尔·薇兹）

中国人擅长山寨，但他们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，中国人擅长山寨，但他们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。一个发明了造纸术、火药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突然变得只会组装苹果产品了呢？我在想，中国现在缺失的是不是不是创新文化，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：信任。（弗里德曼）

社会改革渐进式前进时，我们愿意多做贡献 我希望改革，反对暴力革命。当社会以改革的、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多做贡献；当你真的反着来，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。如果实在保护不了，就只能支离破碎，远走高飞了。（柳传志）

无论你怎么做，人家都会说你不对 以前很多人批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，说这个奖太政治化，现在有人批评他们说这个奖不够政治化。瑞典有一句俗语：“无论你转身多少次，你的屁股还在你后面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你怎么做，人家都会说你不对。（瑞典汉学家、莫言作品翻译者陈安娜）

（综合《南风窗》、《博客中国》、《新周刊》等）